

许 亮◎著

东北亚安全制度中的 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

理论与历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王 毅 著

东北亚安全制度中的 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

理论与历史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 亮◎著

东北亚安全制度中的 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

理论与历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北京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东北亚安全制度中的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理论与历史/许亮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9

ISBN 978-7-5620-5641-6

I. ①东… II. ①许… III. ①国家安全—研究—东亚 IV. ①D731.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6903号

-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86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编辑邮箱 zhengfadch@126.com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内容摘要

ABSTRACT

冷战后，东北亚存在两种安全路径：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同盟体系主导多边机制，还是多边机制替代同盟体系？这将决定东北亚安全模式的未来走向。朝鲜核危机的爆发让这两种安全制度不期而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二者联系互动的视角。本书采用制度主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选取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为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中的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制度能够有效弥补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中的治理缺位。权力不是制度建立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制度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共同利益是形成制度合作的基础，而外部性收益会导致制度失衡；观念塑造国家的偏好，制度离不开观念的指导；制度建立后具有自我持续的惯性逻辑，即“路径依赖”。因此，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念分配和路径依赖是影响国际制度的四个因素。反之，制度也可以分配权力、塑造利益和建构观念。同盟和多边机制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安全制度，但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兼容的。

美韩同盟是冷战的产物，进入后冷战时期美韩之间权力、利益和观念重新分配，同盟难以适应东北亚新的

安全形势，陷入失衡状态，需要重新定义。然而，美、韩对新时期两国同盟的定义是有分歧的：美方主张同盟能够扮演地区“警察”，管理东亚安全；而韩方希望同盟只是朝鲜半岛的“门卫”，保护韩国安全。多边安全模式是摆脱安全困境的最佳出路，但在东北亚却一直处于空白。朝核危机爆发后，六方会谈成为各方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也是在东北亚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一次有益尝试。

在朝核危机中，同盟主义与多边主义发生制度碰撞，六方会谈地位提升，美韩同盟呈弱化趋势。主导权的搁置、利益的可塑性、集体身份的建构和制裁权的转移，这为六方会谈兼容美韩同盟提供了空间。当然，也存在一些变数，国内政治的反复与制度自身的脆弱成为影响二者兼容的最大挑战。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多边安全机制尚不能完全取代美国的同盟体系，二者将共存共容。未来东北亚的安全制度既不会适用“北约模式”，也不会采取“东盟模式”，而是一种嵌套式制度联系模式。中国奉行多边外交，要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多边安全制度建设中去，同时也要谨慎应对美韩同盟的转型。



目 录

CONTENTS

内容摘要	1
导 论	1
第一章 国际制度主义理论	16
第一节 制度主义的源流	17
第二节 国际政治中的制度主义	24
第三节 国际制度的变迁	43
第四节 制度间联系	53
小 结	58
第二章 同盟安全与多边安全：一种制度主义视角	59
第一节 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同盟安全	62
第二节 多边主义理论与多边安全	79
第三节 制度兼容：同盟安全与多边安全	91
小 结	96
第三章 美韩同盟的转型	98
第一节 美韩同盟的历史	99

第二节	地区“警察”：美国定义下的美韩同盟	113
第三节	半岛“门卫”：韩国定义下的韩美同盟	145
小 结		162
第四章	东北亚多边安全制度的雏形——六方会谈	164
第一节	东北亚的安全结构与困境	165
第二节	东北亚安全模式及评价	178
第三节	六方会谈——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雏形	193
小 结		207
第五章	变迁中兼容：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	209
第一节	朝核问题的考验	209
第二节	六方会谈下的美韩同盟	226
第三节	变迁中的机遇与挑战	247
小 结		253
结 语		255
参考文献		270
后 记		287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对象

冷战后东北亚的权力结构呈现一种均势状态，均势的逻辑必然导致安全困境的出现，而朝核危机正是这种安全困境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爆发。如何突破这一困境？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双边同盟，二是多边机制。美韩、美日代表的同盟路径是冷战遗留产物，为能在后冷战时期继续发挥功效，美国进行了同盟的再定义。多边安全机制在冷战后的东北亚一直处于空白，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建立的六方会谈机制有希望成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雏形，这也得到了有关国家的支持。朝核危机的发生让两条安全路径不期而遇，由此引发了我们的问题：同盟安全与多边安全会产生怎样的互动？二者能否兼容？为解答此问题，本书选取了转型中的美韩同盟和处于起步阶段的六方会谈机制为研究对象。二者与朝核问题关系密切，而且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比较有典型性。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 对同盟及其转型的制度主义视角探讨。同盟是一个古老的国际政治概念，是国际关系学界重要的研究领域。同盟本质

上是一种合作行为，有意思的是，在早期研究中，悲观色彩浓厚的现实主义学派一直掌握着同盟研究的话语权，他们认为同盟是国家维持均势的重要手段，相反，对国际关系抱有乐观看法的理想主义对同盟大加批判。^{〔1〕}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就国家间的合作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激辩，这也波及对同盟的解释：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同盟产生于共同的外部威胁，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只能通过自助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面临同样威胁的国家缔结同盟是国家自助寻求安全的一种暂时手段，当外部威胁消失或降低，同盟的凝聚力和效力也会随之降低，同盟趋于解体；^{〔2〕}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制度的成本-收益角度，解释了同盟的自我存续性，构建新制度的成本要远远高于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因而国家宁愿维持现存的制度也不会去选择创建新的制度，同盟作为制度的一种，一旦建立就会产生所谓的“棘轮效应”^{〔3〕}。

〔1〕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杨歧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美〕阿诺德·沃尔弗斯：《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于铁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2〕 参见〔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即同盟建立后就具有持续性，国家宁愿维持遭受严重冲击的同盟，也不愿意选择另一个新的同盟。这是美国学者塞莱斯特·瓦兰德和罗伯特·基欧汉在“Toward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lliances”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关于制度主义对同盟的解释参见：Helga Haftendon, Robert O. Keohane and Celeste A.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Press, 1999;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Autumn 2000), pp. 705 ~ 735; John S. Duffield, “International Regimes and Alliance Behavior: Explaining NATO Conventional Force Level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4 (Autumn 1992), pp. 819 ~ 855; David Lake, “Beyond Anarchy: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建构主义兴起后，也加入到同盟研究的行列中，认为国家的行为不是被“结构”所决定，而是被“观念”所左右，因而维系同盟关系的是行为体的集体认同感。^[1]冷战后随着共同威胁的消失或降低，苏联美国所构建的同盟体系既没有瓦解，也不是简单的维持，而是进行了转型，即超越同盟的传统功能，由对内防御扩大为对外干涉，由维护成员安全扩大为维护地区安全，形象地说，就是从一个“防御者”转变为一个“管理者”。这一变化对传统同盟理论的解释力带来很大挑战。本书试采用制度主义理论对同盟的这种转型做出解释。

2. 多边主义理论探讨。多边主义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研究的一个热点，像约翰·鲁杰（John Ruggie）、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等学者都对多边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实主义学派的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需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监督、制裁违规者的责任，在霸权缺失的情况下是很难建立起制度，或霸权衰落后国际制度就会解体。^[2]多边主义对霸权主导下的合作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多边主义认为即使在没有霸权国的情况下，少数行为体（多于三个）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建立多边制度，由集体共同提供公共产品，而且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对国家的利益、偏好以及行为

（接上页）（Summer2001），pp. 129 ~ 160.

[1]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Press, 1990;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参见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产生影响。^{〔1〕} 多边主义在安全领域的运用被称为多边安全，多边安全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安全模式，它包括多边同盟、大国协调、集体防务、集体安全等多种模式，而且随着制度的推进，多边安全模式会出现向高层次演进的趋势。多边安全是集体合作提供安全的行为，但安全是否具有完全的相容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多边合作中的成本分担如何分配，是多边安全理论中争论的焦点，本书对此提供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3. 对制度兼容理论的探讨。探讨双边同盟与多边主义的关系是本书最大的理论价值。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二者的关系多持悲观态度：现实主义学派虽然对同盟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认为同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2〕}但还是肯定同盟作为维持均势和安全手段的有效性，而对多边主义则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多边安排对国家影响力非常有限，很难取得成效，这在现实主义对集体安全的论述中表现格外明显；^{〔3〕}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虽然对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都予以肯定，但也多认为二者是很难相容的，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理论渊源——集体行动理论的观点，“小集团”行为是导致集

〔1〕 [美] 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如托马斯·柯庆生与杰克·斯奈德提出的“囚徒捆绑”和“推卸责任”的困境，格伦·斯奈德提出的“受牵连”和“被抛弃”的困境。See Thomas J. Christ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 137 ~ 168;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4, No. 3 (July 1984), pp. 466 ~ 494.

〔3〕 See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 ~ 49; Charles A. Kupchan and Clifford A. Kupchan, “The Promi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52 ~ 61.

体行动失败的重要因素，^{〔1〕}因此，多边框架中的双边同盟会导致多边主义的终结。然而，目前东北亚安全结构现状却是双边同盟与多边主义共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互兼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本书借鉴了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兼容的概念，希望能对此做出理论解释。

（二）现实意义

1. 美韩同盟关系的转型。近几年来美韩同盟关系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将会对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产生影响。一方面，韩国的反美自主倾向增强。2003年卢武铉在韩国反美浪潮中就任总统后，对韩国的外交防务政策进行了一次革新，“自主外交”、“自主国防”、“收回作战指挥权”、“反对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调整”以及“东北亚均衡者论”等，被称为“卢武铉主义”。这引起了美国的担忧和不满，一时间美韩关系龃龉不断，“美日韩三边互助体系”瓦解之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在卢武铉政府后期，特别是李明博上台后，美韩军事同盟又有强化和扩大之势。2006年美、韩双方达成协议，驻韩美军由昔日“专注朝鲜半岛防务”，转变成为干预亚太地区事务的“机动军”，美韩同盟的性质由内向的防御性同盟转变为外向的干涉性同盟；2008年李明博更是将双方关系提升到“战略同盟”的高度。本书将对美韩同盟关系变化的背景、过程和前景做出论述。

2. 东北亚的多边主义安全制度的构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带有冷战色彩的安全结构逐渐瓦解，新的安全结构尚处于构建当中，各主要国家的角色定位与安全路径都面临着重新选择：中国崛起为亚太地区“负责任的大国”，努力构建东北亚多边合作安全；美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离岸平衡

〔1〕〔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手”，在东北亚地区推行双轨策略——一方面强化同盟体系，另一方面推行大国协作；日本由东北亚安全的“搭便车者”向“参与者”转变，借助日美同盟谋求更大安全权利；韩国寻求扮演“东北亚均衡者”，摇摆于自主安全和追随美国之间；朝鲜为摆脱被边缘化的困境，采取核边缘政策。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东北亚各国面临着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越来越多，安全利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明显，传统的零和式绝对安全观已不适应于东北亚安全形式，它只会加剧东北亚的安全困境，构建多边主义安全制度是解决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唯一出路。目前，东北亚的多边安全安排还处于初级阶段，六方会谈可以看作是未来东北亚多边安全制度的雏形。本书将对以六方会谈作为基础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制度进行深入探讨。

3. 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的兼容。朝鲜威胁一直是美韩同盟的主要基础，朝核问题成为美韩同盟由“安全防御者”向“安全管理者”转型的试金石；而六方会谈是为解决朝核问题而建立多边安全机制。这样，在朝核问题上就出现了两套安全制度同时运作情境。如何解释二者共存、相容的现象？是六方会谈影响美韩同盟，还是美韩同盟主导六方会谈？这一问题不仅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折射出当前东北亚安全出路一大困境，即如何处理同盟安全与多边安全的关系？前者是历史遗留产物，短期内不能消除，只能带来局部安全；后者是全球化时代下的安全形式，历史趋势不可阻挡，能够产生共同安全。通过对美韩同盟与六方会谈关系的考察，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新思路。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东北亚地区安全研究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目

前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高连福的《东北亚国家对外战略》、陈峰君的《亚太安全析论》、苏浩的《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研究》、刘清才的《21世纪初东北亚地缘政治》、阎学通的《中国与亚太安全——冷战后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走向》、吴心伯的《太平洋上不太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写的《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构想》等。这些学术著作比较系统详细地阐述了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和主要国家的安全战略及政策。

冷战后的东北亚地区安全研究也是美、日、韩等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受语言因素的限制，笔者主要参阅了一些代表性的英文资料，如科林·麦克尼士（Colin Mclnnes）和马克·G. 罗尔斯（Mark G. Rolls）主编的《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安德鲁·麦克（Andrew Mack）和雷文秀（John Ravenhill）编写的《和平的合作：构建亚太地区经济安全机制》、斯蒂芬·P. 吉波特（Stephen P. Gibert）编写的《东北亚的安全：走向太平洋世纪》、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主编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亚太地区》等。美国学者关于东北亚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研究上：第一，后冷战时期东北亚是一种均势结构还是以美国为霸权的“轮毂”结构？第二，中国是东北亚安全秩序的修正者还是现状维持者？

（二）同盟理论与美韩同盟

同盟理论是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基础理论，西方传统现实主义学派对同盟做了大量研究，而理想主义学派则斥同盟为战争的根源而加以否定，代表性的著作有：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国家间的政治》和《联盟的理论与实践》，对联盟作为维持大国均势的重要工具予以肯定，国家采取联盟政策只是权宜之计，结盟的对象可以随情况变化而任

意改变；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家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主编的《冷战中的联盟政治》（*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总结了当时联盟理论的最新成果，如联盟既可以增加权力，给敌人以威慑，也会限制国家的行动，陷入不该介入的冲突；威廉·赖克（William H. Riker）1969年出版的《政治同盟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解释同盟的形成、运作和瓦解，即国家必须审时度势，权衡参加同盟的利弊得失；于同年出版的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的《联盟中的国家：相互依存的有限性》（*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对联盟的功能做出了研究，联盟除了维护国家安全这一主要功能外，还有控制成员国和通过联盟求得国际承认的两大功能。20世纪80年代后，新现实主义学派借鉴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对同盟理论进行了更为严谨的研究，代表学者及著作有斯蒂芬·沃尔特的（Stephen Walt）《联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s*）、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联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s*）以及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和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等。沃尔特对传统同盟理论进行了改进，提出“威胁均衡论”，国家结盟是对“威胁”所做出的反应，即国家结盟主要是出于“制衡”而非“见风使舵”；斯奈德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同盟困境”理论，任何结盟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被“抛弃”和“牵连”的困境之中；柯庆生和施奈德提出“被拴在一起的囚犯”和“推卸责任”两个概念，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还是防御性战略，同盟的运用是不同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兴起，开始挑战现实主义学派在同盟理论研究中的话语主导地位。主要学者和研究成果：罗伯特·基欧汉著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和其发表于1996年的研究文章《联

盟、威胁和新现实主义的运用》(Alliances, Threats, and the Use of Neorealism)、罗伯特·麦克卡拉 (Robert McCalla) 《冷战后北约的存续》(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等。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修正了现实主义学派对同盟的工具性态度, 同盟的制度化对同盟的存续产生重要影响, 即便是威胁消失或霸权衰退, 同盟仍然会存在并发挥功效, 因为维持制度的成本要低于抛弃或创建的成本。近年来刚刚兴起的建构主义学派也加入了同盟理论的研究当中, 代表人物有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托马斯·锐生卡朋 (Tomas Risse - Kappen)、泰德·霍普 (Ted Hope) 等, 建构主义主要观点是: 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在同盟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且有助于形成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

关于美韩同盟关系的研究, 随着近些年来韩国学在中国的普及和升温, 一批有学术价值的专著陆续出版。如陈峰君、王传剑合著的《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中比较系统的梳理了二战后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演变; 王传剑著的《双重规制——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则分析了冷战后的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认为美国的政策包含两个层面, 一方面规制“无赖国家”——朝鲜, 另一方面规制周边大国; 王帆著的《美国的亚太联盟》重点分析了近年来美韩同盟关系调整, 并运用传统联盟理论给予了解读; 汪伟民著的《联盟理论与美国的联盟战略——以美日、美韩联盟研究为例》发现传统的联盟理论很难解释冷战后美日、美韩同盟的转型, 从而构建一种“威权式联盟”理论, 分析了美韩同盟的“再定义”。一些研究文章也对美韩同盟的微妙变化给予了关注, 如石源华和汪伟民的《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郭宪纲的《韩美同盟寻求新定位》、杨红梅的《美韩同盟调整的动力、现状与前景》、李军的《驻韩美军